

菜市场的棋局

明前茶

这家位于城东的菜市场里,开店卖烤鸭和盐水鸭的老徐是个名人。每天,他的店铺要卖掉起码50只鸭子,周末和节假日翻倍。下午一点半钟,斩鸭子的顾客终于散去,老徐店门口的折叠小方桌上,立刻放上了棋盘,卖莲藕的、卖烤饅的、卖鱼丸和虾丸的小老板都热切等着,老徐若没除下他的一次性手套来加入,棋局多半是不会开场的。

老徐棋艺一般,远不及卖鱼丸的老蔡,但若他不来,对手连赢三盘也觉得没味。

看官可能惊奇:老徐为何有这股威望?遍布南京的熟食店都在卖鸭子,每天手起刀落,把半只鸭子整整齐齐斩成18片或20片的小老板,估计能有一万个,他们同样能把烤鸭烤得流光溢彩、蜜色诱人;能把腌好的盐水鸭低温慢焖,做出“皮白肉红骨头绿”的好卖相。要是李安重拍《饮食男女》,这些小老板也绝对可以当男主角的“手替”。可为什么偏偏是老徐这家店开了30年,人缘好得像是菜市场里的大哥呢?

如果你隔三岔五来排队斩鸭子,并留心观察,你就会明白其中的门道了。

夏去秋来,对门卖凉面混合的小店撤走,新来了一位卖肉夹馍的小老板,西安人,棋艺很臭,老徐与之下了几盘棋,就听他埋怨说,生意并不好,南方人控制体重的意识非常强,传统的肉夹馍,要当着顾客的面,夹取一块连肥带瘦的卤肉,切碎后夹进馍里,顾客一看就嫌油腻。老徐一面在棋盘上落子,一面跟他建议:少做一点卤肉,每天多做几十个白吉馍(指肉夹馍的“饼壳子”)。卖肉夹馍的小老板很困惑:“为啥? 没有卤肉和肉汁,白吉馍吃起来可噁人了……”老徐卖个关子,只是说:“我自有机计,过一天你就知道了。”

隔天,见到熟悉的老客,老徐忙着替他们斩鸭子、舀卤汁,顺带推荐:“要不要再来一副鸭肝? 努,瞧见我对门的店没有? 那家的白吉馍做得漂亮又正宗,俗话说叫作‘铁圈虎背菊花心’,那种馍,火候到位,香气逼人,你就买几个一块钱的开口白吉馍,回家后把我这烤鸭脯子和鸭肝切碎了,加上一小勺青椒碎,混合,填在白吉馍里,加一小勺烤鸭卤子,嘿,那风味,你脑袋里要是没有竖起感叹号,你来掀了我家的招牌。”

顾客一听这描绘,眼睛发亮,外焦内软的白吉馍,就算白嘴吃,口感也不差,何不回家做一次实验?

傍晚六点,小老板的卤肉还剩下好几块,一大筐白吉馍都卖完了。不服不行,小老板第二天下午时,就跟老徐讨教。老徐告知本地人的口味偏好,小老板心领神会,接连推出好几款新口味的肉夹馍馅料:烤五花肉加生菜,焦香中夹杂一丝爽脆;卤牛杂加一小勺煮得稀烂的牛肉,可以衬出牛杂的不同口感,有些绵韧,有些弹脆,有些软糯;擂椒皮蛋加蒸腊肉,有一股粗犷浓郁的重口味,晶莹剔透的腊肉加上皮蛋的溏心、擂椒的辛辣,简直绝了;传统卤肉也有改进版,添加熟养麦粒、玉米粒及洋葱碎,既可解油腻,又加入了丰富的色彩与口感……思路一打开,整个菜市场的熟食摊位:清真牛肉铺子、烤五花肉铺子、蒸腊肉铺子,都成了肉夹馍店小老板的大后方,而如何合作,如何分享利润,都是在鸭子店门口的棋局上捎带着谈成的。

这些基层小老板的合作,就像一张绵密的网,它有弹性,有韧性,兜住了竞争带来的激烈冲击,托住了每一个家庭的柴米油盐。

生意有了进展,肉夹馍店的小老板很不好意思,觉得欠了老徐的人情,非要买一箱桃子来答谢。老徐笑着婉拒,让他把桃子带回去给孩子吃。老徐回忆道:“30年前,我刚在这里开鸭子的店,生意也很一般,那会儿,是旁边做春卷皮的李大妈扶持了我。”老徐彼时20岁,还是小徐,李大妈为其出主意,见缝插针地做些烤鸭饼,并切好葱丝和黄瓜丝。她让小徐挂出小黑板,声称“买一份鸭脯肉,加两块钱就有烤鸭饼和配菜,回家立马可吃美味的烤鸭卷饼”。一只刚出炉的烤鸭,晶莹剔透,浑身好似流淌着蜂蜜与晚霞,小徐飞速地片好鸭肉,每一片,都连皮带肉,形如一枚柳叶。自打李大妈的策略奏效,鸭子店每天能卖出的烤鸭,一下子从十来只,增加到三四十只。

那是如今的老徐在金陵城立足的第一步。

“李大妈当年大概60岁,为了照顾我的生意,她开始摊烤鸭饼。她手艺好,饼子摊出薄得透明,可以像纸一样捏拢再放开,舀一勺烤鸭酱涂在饼上,一滴不漏。李大妈今天要是健在,该有90岁了。”

晚风中,老徐的声腔带上浓稠的怀念,也许,正是李大妈的善意,让他暗下决心,要尽可能地扶持这个市场的新人,为他们出主意,把他们当搭档,而非对手。他做到了,只是,他也为之付出了小小的代价:因为心思没太放在棋上,下了这么多年的棋,依旧被卖鱼丸的老蔡压着打。老蔡已经表态:老徐,在你旁边卖了20年鱼丸,上了棋盘寸步不让,才算拿你当一条汉子看。

老徐笑着点头,只听“啪”地一声,他的“卒”又向前移动了一格。

烽火少年

巴忠人

巴忠人

出生1935年3月,7岁随父辗转于抗日战争中,1949年4月南下到武汉。先后在武汉市二中、五十二中、六十八中、武汉市建委、中共武汉市委办公厅、武汉市保密局等单位工作。

我的少年时代,是在战争的动乱年代度过的,跟随当八路军的父母转移。形势紧张,特别是在日伪军扫荡时,就跟随父母随军反“扫荡”。时局稍稳定,或者到了抗日根据地,生活才能稳定下来。这时父母就把我寄养在老百姓家里,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,我也就成了这家的成员之一。为了掩护身份,防止日伪的突袭,我就改变姓名,跟这家姓。这家的老人就成了我的爷爷奶奶、干爹干妈、叔叔伯伯,这家的孩子也都与我以兄弟相称。这时我才有机会随这家的孩子在村里的小学读书。但这样的日子都不长,一般都是两三个月,最多也不超过半年。所以我到底在多少村庄住过,有多少个干爹干妈,起过多少个名字,我自己也记不清楚。至今能记得的地方,一是栖霞县的康家,二是蓬莱县的门楼镇,三是蓬莱县的郝家。

在栖霞县的康家,我是跟随伯父、伯母在一起。由于日伪汉奸的逼迫,伯父投奔革命以后不久,伯母也率领全家背井离乡,到了栖霞县根据地。当时伯父在北海中学工作,就在北海中学这一带活动,在这里我才有机会上学。康家是一个小山村,所谓的小学,只有几间房子作为教室,而教师只有一个。遇到飞机轰炸,我们就钻进山后的树林里,挂块小黑板,听老师讲课。

1944年晚秋,我随巴山大姐到栖霞县到蓬莱县门楼镇,我们一行十多人,在日军的炮楼间穿行,还要过敌人的封锁线。当时我还不到10岁,跟随大人们急行军十分辛苦。有一天晚上住在一个村里,村长安排我们住在一间屋里,女同志睡在炕上,男同志睡在铺了麦秸的地上,我与男同志睡在地上。一天的行军大家都十分疲劳,睡得很沉,第二天早上起来,我的左腿不能动了,原来是一位男同志的步枪和腿压在我的左腿上,压了一个晚上,血脉不通。早饭后又要赶路,大家只好轮流背着我走,就这样一直背到了门楼镇。从此我的左腿落下了毛病,经常腿疼。到了门楼镇,我与父母会合,住在一起。这里是根据地,八路军的一些机关、工厂都在这里。我们的房东是个年轻的寡妇,叫时贵莲,我认她为干妈,也随其夫姓,改名为朱德斌。这是战争年代我所能记住的唯一一个干妈的名字和我所用过的名字。干妈无儿无女,对我非常好。她是妇女抗日救国会的骨干,像我妈一样也很忙。我就在村里的小学读书,参加抗日宣传活动。在门楼镇时发生了两件事,至今我还记忆犹新。在门楼镇上小学时,儿童团经常搞抗日宣传,刷标语,演节目,我是个活跃分子。在一个晚秋的夜晚,我和几个儿童团员在朱自英大姐的率领下,去一个小山村演出,慰问八路军。我扮演的是《小放牛》里的牧童,演出受到了官兵们的热烈欢迎。后来听说许世友司令也在那里看演出。演出结束已经很晚,在回来的路上我们还十分兴奋。那天晚上月朗星稀,山村很寂静,除了山风吹起的阵阵松涛声,就是我们叽叽喳喳的谈笑声。在过一条小河边时,朱自英大姐一不小心踩在石头上滑倒了,一屁股坐在河里,弄得裤子湿透了。她在我们这一群中年纪最大,这一滑倒引得我们哈哈大笑,惊得林鸟纷纷鸣叫着飞起。另一件事也是在这个冬天,河里已经结冰。一天夜里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村子,母亲拉起熟睡的我,就和其他的同志迅速突围。在过一



守望(中国画)

李爱国作

条小河时,我不小心,一只脚掉到了冰窟窿里,鞋子掉到了水里,来不及找,母亲拉起我就往山上跑。这样赤着一只脚跑进了一个山洞,这时的脚已被冻僵,不知道疼,但已被石头划破了。母亲只好撕下一块包袱布给我包起来,等到敌人退去才下山。但脚冻坏了,好长时间才好。这些事至今回忆起来,还历历在目。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掩护,我们很难在敌人的疯狂扫荡和残酷封锁下生存下来。

抗日战争胜利不久,蒋介石就打起了内战,窜犯胶东解放区,我们被迫从县城退到山区。这时父亲已调到了胶东行署,我随母亲退到了蓬莱县的郝家村,这是一个依山临河的村子。我们住在母亲的姨母家里。母亲的姨母、姨父都还健在,还有一个表妹和表弟。我叫母亲的表弟小舅,我们两个年龄相仿。由于国民党经常窜犯,我们无学可上,只好与村里的小伙伴一起上山打柴,干些农活。但这样的日子常常被扫荡的国民党军队打破。就在这个冬天的一个晚上,有情报说,国民党军队出来扫荡,母亲连夜组织群众转移,我在慌乱中拿着一颗手榴弹,就跟随一群人往山里跑。这时只听到远处激烈的枪炮声,越来越近。子弹像烟火一样,尖叫着划破夜空。我也不知道母亲到哪里去了,等到天亮一看,原来我随着人群来到山沟,那里有一群被民兵押解着的地主土豪,这时我才有点害怕,想到他们一旦闹起来,民兵控制不住,我这个小八路可就有点危险了。我赶紧跑开,往其他的山沟里跑去。敌人搜山搞了一天。我跑出来时没来得及带吃的东西,肚子饿得直叫唤,只好到地里捡些冻了的地瓜和花生吃。战争就是这样,是坏事,但也锻炼了人。我的吃苦耐劳和临危不惧的品行,应该说是战争年代逼出来的。

日本投降后,我们进驻蓬莱城,父亲时任蓬莱县副县长,我在城东门里的长裕小学读书。再就是国民党被赶出胶东,我们重回蓬莱城,这时我住到了母亲的老家,离县城四里路的司家庄,住在大舅司子钟家,每天到村里的小学上学,帮大舅干农活。在司家庄小学,我当上了儿童团的团长,还参加了村里宣传减租减息,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,当看到贫雇农翻身得解放的幸福样子,我也很高兴。虽然我不是村里的人,但是村长经常表扬我,还奖励了我一件小棉袄和一把带木剑鞘的小刀。

在人生的道路上,少年时期是短暂的。但对我这个跟随父母在战火中出生人死的小八路来说,生活的经历确实是十分丰富的。它不仅培养了我艰苦朴素、吃苦耐劳、坚韧不拔的性格,也养成了我平易近人、热爱群众的习惯。直到随军南下到了武汉,十四岁的我才进了正规的小学,从五年级读起。但战争又是一个大课堂,让我看到了许多灾难,种种痛苦,教给了我许多知识,使我懂得了许多道理,使我早早成熟起来。战争给我的最大收获是,我懂得了老百姓不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,也是我们制敌取胜的坚强后盾,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今天的革命政权。得天下难,坐天下更难。难在哪里呢? 就难在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,永远不脱离群众。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。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个道理。

武汉的温度

宋殿儒

我一生到过不少地方,那些经历中的酸甜苦辣咸,几乎尝了个遍。唯独武汉这座能自然调节我人生温度的城市,给我留下的,始终是甜美的印记。

第一次随爸爸来到武汉,正是一个夏日的中午。我们一下车,爸爸就领着我去了一个瓜摊。在去瓜摊的一小段路上,我尝到了城里太阳的厉害。那阳光白亮刺眼,射到我裸露的胳膊上,热辣如针扎。可为了跟爸爸来城里看稀罕,我忍着不吭声。

来到瓜摊前,我们忙躲进卖瓜人搭的棚子里。往地上蹲的一瞬间,憨厚的卖瓜老人微笑着递给我和爸爸两块西瓜,说:“天热,先尝尝,不凉不甜不要钱。”对于老人送来的西瓜,我开始不敢接,因为我不知道城里的规矩,没掏钱就吃瓜会有什么后果。老人好像一眼就看穿了,忙上前跟我说:“吃吧,我这西瓜都是先尝后买的,不甜不要钱,这也是我们武汉的规矩。”

就在我看看爸爸的脸色,伸手去接老人递来的西瓜时,瓜棚里仿佛吹来一缕凉丝丝的风,那风一下子沁入心底,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凉爽和惬意,更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美好与善意。

也许是热极而生凉意吧,反正,那次武汉人送来的“夏日凉风”,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——因为它曾深深感动过我年幼的心灵。

时隔十多年后的一个夏天,我又有机会来到武汉。

刚下车,武汉的朋友已经迎在车前。我想,朋友一定会把我接到有空调的酒店去。谁知,他们竟把我拉到一处瓜摊,要我先品尝当地田野里长出的西瓜。老实说,城里的西瓜多是从小乡下来的,没有污染,又甜又凉。可真正让我感到清凉透心的,还不是西瓜,而是吃瓜后发生的一件小事。

那位卖瓜的也是一位老伯,对我们依旧是热情的先尝后买。我们吃完西瓜,朋友付钱走人。坐上车刚起步,我忽然从倒车镜里看到那位卖瓜老伯正拼命追过来。我们连忙停下,下车问他有什么

宝塔河不在小溪塔

蔡小容

傍晚,天色还亮着,远远地我看见一座塔,就朝它走过去。这一带叫宝塔河,我从没来过这里,只是在去宜昌东站的路上多次经过,这里距离市中心很远。我恍惚地想,这是不是小溪塔的塔呢? 宝塔河,小溪塔,这两个地名仿佛有关联,能组成一幅画。我好像的确看到过这样的画,在20世纪80年代的地市级粮油票上。

走近那座塔,围栏边有石碑刻写的说明,它叫天然塔,是一座古塔。始建于晋代,清乾隆年间重建,为八棱七层楼阁式空心塔砖,早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。很奇怪,我先前居然不知道。我以前在宜昌的活动范围太小了。以我现在城市漫步的劲头,一天里能在宜昌城区踮几圈。

天然塔矗立在长江边,我沿江畔走去。如果一直往上游走,就会走到市中心,我经常徜徉的滨江公园那一带,正对着磨盘山。那座山的形状工整,十分可爱,绵延到其他相邻小山的线条也流利匀净,真是山清水秀,我怎么也看不够。我乘公交车沿江而行,窗外的江上山色像一道长长的画廊。我带着这个疑问向旁人打听,天然塔是不是小溪塔的塔,答曰不是。天然塔在市区,小溪塔原是县城,现在划为夷陵区,那里并没有一座塔。——“看你,好像不是宜昌人一样。”

我在宜昌出生长大,十七岁上大学才离开。在宜昌的那些年,我每天的活动路线都是两点一线,从家到学校,从学校回家,很少去其他地方。我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老城区的几条街,宜昌本来不大,被我越走越小。

我高一那年去过一次小溪塔。国庆假期,我爸爸的一位住小溪塔的朋友邀我们去做客,妈妈加班,爸爸带我和妹妹一起。小溪塔那时还是县城,很远,照理应该搭公交车去,但也可以骑自行车去。爸爸问我,我说骑车——他骑车,带我和妹妹。我之所以这么回答,是因为平时很少坐公交车,车少难等又拥挤,我觉得坐我爸的车省事。于是爸爸骑自行车,妹妹坐在前梁,我坐后座,我们出发了。没骑多久,路上戴袖章执勤的一名中年人把我们拦下了。他倒是很和人,说我们这样很危险,“您又这么大了”——爸爸当时已年过五十,建议我们搭车去。爸爸也笑着答应了,但自行车仍然得他骑,于是他把我送到一个公交车站,陪我等车来,告诉我他在哪一站,在那里会合,他就骑车带着妹妹走了。

开往县城的路线有好多个站,沿

事。老人气喘吁吁地递上一张纸条,说:“这……这纸条是从你钱里掉出来的,上面有地址和电话……看,看是不是有用……走远了就找不到你们了……”

朋友这才猛然想起,出门时走得急,将要联系的那个人的地址和电话,随手记在纸条上,夹在了钱包里……若不是这位好心的卖瓜老伯,可就就误了大事!

朋友接过老人递来的纸条那一瞬,我的心上再次吹来了十多年前那样的清风,不只清凉到心底,更湿润了眼眶。也许是我经历了太多被蔑视、被刻薄、被市侩算计的境遇,在武汉这片土地上,这份善意才格外令我动容。

而武汉的这些朋友们,并没有像我那样激动不已,好像这种事,他们早习以为常。

人生并非坦途。那年我与合伙人合伙做生意,被坑得身无分文,万般无奈之下向朋友们求援。结果,那些过去耳边“兄弟”来“兄弟”去的所谓朋友,纷纷找借口推脱,甚至还有几个干脆把我拉黑。唯独武汉这位自身生活尚且艰难的朋友,给我汇来一千元路费,让我先到他家落脚,与他在武汉再谋出路。

记得那是个格外冷的冬天,朋友把仅有的两室小屋腾出一间给我住,把自己结婚时的一床好被褥给我用。免费吃住的那一个月里,我真切感受到了武汉人情的厚道与温热。

后来,我和这位武汉朋友从街边摆摊卖面条起步,慢慢打拼,总算有了一些起色。

一座城市的美,其实并不只在它的外表与传说里,更美在内里,甜在细节,暖在难忘的温度中——盛夏它赠你清凉,寒冬它予你温暖。武汉,就是这样一座浸在人间烟火里的温暖之城。

后来,因年岁渐长,我回到老家,而武汉却始终是我梦中最温暖、最有气度、最有品位、最有甜味的“故乡”。那一缕缕清风,那一张张笑脸,那一次次真诚的相助,以及街巷里那一声声温馨的问候,都历历在目……

途我都不知道是哪里。坐到不知什么地方了,我忘记了在哪一站下。到某个站时,我犹豫着不能确定,这时前排有个人回过头来看看我,告诉我这个站的名字。他是刚才听见了,帮我记着。我赶紧从窗边的里座出来下了车。

下车的地方是山边,我站在路口等爸爸。等了好久,他都没有来。是我下错站了吗? 我在阳光下等得没有希望了,决定坐车回家。在哪里上车呢? 搭公共汽车的经验我几乎没有,何况这是我没来过的县城,周围几乎无人经过。不记得我问了谁没有,终于我和一个老农一起在路边等车。没有站牌,车也不知道来不来。我们等了好久,我看那个把草帽抱在怀里、坐在地上的老农,黝黑的脸色中带着愁苦,我的心情也恰如那神色。后来车居然来了,我坐车回了市区,下车后认得路了,走回了家。

爸爸在路上也没等到我,到朋友家匆匆吃了午饭就告辞,骑车带着妹妹赶回市区。他到家时,我已在家里写作业,他说他心神不安,不敢停留,生怕把我弄丢了:“你妈打我!”我们没有碰上,是因为我下车的地点与他估计的不同,差了一段路,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等待,都等不着。那是1986年,又是县城地带,这情形太正常了,公交车在哪里停靠并不规范,人们也没有联系方式。我应该庆幸,十四岁的我没有走去。

三十多年后的今天,我回宜昌办事,去偏远的村镇。去时搭车不便,但有人开车顺路带了我一段。办完事后,我准备返回,打开导航,骑车回村大约四十分钟,于是我在路边打开一辆共享单车,一路骑行,骑过桥头,骑过山边,骑过高架,骑上公路,我不断停车拍摄沿途的风景,绿荫如盖,夕阳如金。我骑行的同时不禁想到,我能在此如此偏远的地方自由行走,还是得益于我时常抱怨的手机。假如没有互联网和智能手机,就不会有共享单车,不能随时骑行,不能查询公交站在哪里,也根本不知道路线。我不能以现在的条件去衡量四十年前,当年,我即使想多走走,也走不了多远。

骑过某个标杆建筑,手机上共享单车的语音提示传来:“您已骑出运营区,超出运营区还车将收取车辆调度费。”但我还得往前骑,路还远。快到村子了,我在隧道边停下,试着关锁,成功了,这里可能又是运营区。我步行进村,办完交接,再走回路口,打开百度地图,叫了一辆网约车回市区。